

导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 发展阶段和发展线索

目前国内已出版的中国政治经济学史方面的论著，在阶段划分上多以重大政治事件为依据，也有的以重要经济理论问题的论争为依据。我认为，经济思想发展阶段必然地要受到历史背景的影响，因此，发展阶段的划分应当比较准确地反映历史状况。中国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过程，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既由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所决定，但又在相当程度上受到社会政治演变的制约。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到 1978 年这一段时期，由于当时特殊的社会背景及历史条件，政治和经济的 关系发生了某种扭曲，社会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十分强烈，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与此相联系，经济学乃至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也就必然非常深刻地受到当时社会政治的影响。由此所决定，经济学理论发展阶段的划分就很难以一条清晰的社会经济发展线索为依据，而不得不打上深刻的社会政治变革的烙印。

为了使经济理论发展阶段的划分既能基本反映社会经济的发展线索，又具有鲜明的历史标记，我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1949 ~ 1978 年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初期发展阶段；1979 ~ 1991 年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繁荣发展阶段；1992 ~ 2000 年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深入发展阶段。

一、1949～1978年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初期发展阶段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经济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中国的经济思想在历史上曾形成过几个大发展时期：一是春秋战国时期；二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三是1949年建国以来。1949～1978年作为这个大发展时期的前期阶段，曾产生过一些相当重要的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并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确立了一个基本的框架。

从发展特征看，这一阶段的经济理论主要表现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线索。这条线索是承袭了“五四”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著作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并运用其原理来分析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同时还表现为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以及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系统介绍以及对我国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影响。这一时期我国经济理论界对于一些重要问题的论争以及在论争中所产生的一些卓越的思想观点，基本上都是从这条发展线索的不同角度出发考察、研究问题而引起的。例如，毛泽东在建国初期先后发表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对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经济建设的全局发展作出了战略规划。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既是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出发分析与研究现实经济问题，也充分吸收与借鉴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并进而提出了许多有创造性、发展性的理论观点，对我国经济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又如，这一时期对一些重要理论问题的论争如政治经济学的

对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政治和经济关系、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值规律和商品生产、按劳分配、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等等，基本上都是以上述两条发展线索而展开的。再如，这一时期所产生的一些卓越的理论观点，如毛泽东关于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关系的论述，李平心关于生产力经济学的论述，王亚南运用《资本论》体系来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论述，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孙冶方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论述等等，也是循着上述两条发展线索在有关问题上的互相探讨、论争而产生的。

这一时期，对西方经济学的引进、研究大抵限于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介绍和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批判。这种介绍和批判在当时较难构成一条明晰的线索，对主流发展线索的影响也相当微弱。

在这一发展阶段，尤其是从建国后到 1957 年，中国经济理论界基本上还是相当活跃的。各种思想、理论、观点的争论此起彼伏、热闹非凡，呈现出“百家争鸣”的景象。但从 20 世纪 50 年代末起，随着社会政治生活中“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指导思想的确立，经济理论研究也深受影响，活跃局面逐渐消失。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科学、客观地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学术思想受到压抑和打击；而片面、教条、形而上学地理解和运用社会主义理论的学术思想占主导地位，并日益向极端化发展。在 1958 年到 1960 年的“大跃进”时期，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开始具有更多的政治色彩而学术色彩逐渐淡化。在片面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政策路线（总路线）指导下，经济理论界围绕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多快好省”与经济规律的关系、政治挂帅与经济利益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讨论。从讨论的情况看，比较多数意见是主张政治第一、经济第二，认为经济工作及其他业务工作都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政治要统帅经济。虽然也有学者提出政治要落实到生产、落实到业务。

但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下，这些意见遭到批判。随着“大跃进”以后的经济调整及党内政治斗争的尖锐，经济理论研究中的“唯政治”倾向越来越严重，并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了极端。

1966年5月，我国进入了“文化大革命”的非常历史时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科学等都遭受了一次浩劫，基本上处于发展停滞的状况。这一时期，事实上已不存在经济学的研究，一些所谓的“经济理论”只是出于政治目的而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歪曲和篡改。例如，在批判“唯生产力论”、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批判“按劳分配”、批判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等的思想理论界的斗争中，一些违反乃至“修正”科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谬论以极左的面目蛊惑人心，左右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这一时期极左的经济理论主要集中在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组织编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书中。以后，全国各地都相继围绕这本书出版了一些学习小册子。这些出版物就是这一阶段经济理论的“成果”。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思想理论界仍在“两个凡是”极左观念的禁锢下，经济理论研究领域未有实质性的松动。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二、1979～1991年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繁荣发展阶段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思想学术界又获得了蓬勃发展的生机，经济理论也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阶段。而且，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理论发展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和实践性，在努力使经济理论研究成为真正的科学研究方面前进了一大步。

这一阶段的经济理论大体上有两条发展线索。一条线索是对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并与中国的经济改革实践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在基本理论的建设上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时，以斯大林理论和苏联范式为核心的所谓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线索，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已开始湮灭（当然，其积习的消除则是旷日持久的），另一条线索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引进、研究和应用。这后一条发展线索虽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呈现，但与 1949~1978 年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介绍和批判有传承关系，并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已与第一条发展线索互相交汇、互相融合，初步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交融会通的主流趋势。例如，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经济理论与经济改革实践相结合所产生的一系列突破与创新，包括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关系、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以及国有企业改革理论等，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吸收与借鉴西方市场经济理论中的合理因素而提出和创立的。又如，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市场化改革及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经济现象，如财政赤字、通货膨胀、产业结构调整、农业劳动力转移、失业、非国有经济的成长、要素市场尤其是金融证券市场的产生和发育等等。由于这些经济现象是发生在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而这个转轨目标又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一种社会经济环境中，所以无论是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还是纯粹的西方经济理论，都不可能单独运用，必然要将上述理论相互补充、互相交融，才能对特殊社会环境、特殊经济条件中出现的经济现象作出准确合理的解释。再如，从经济学研究人员的构成看，当时大多数经济学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兼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西方经济学的基本训练。他们通过对中国经济的分析判断，认识到墨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成结论不足以解决

中国的经济改革问题，因此必须创新；又认识到仅靠西方经济学亦不能准确地分析和解释中国经济，因此必须对其作科学的分析与借鉴。

另外，这一阶段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这两条发展线索的交融还突出地表现在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变革上。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主要是采用规范分析的方法，侧重于依靠逻辑推理构造抽象的理论和规律，而疏于对现实经济生活的解释和分析。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经济学的引进，随着新一代经济学者的成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方法逐渐推广采用。这种研究方法不掺入研究者的主观偏好和价值评价，旨在说明现实经济运行“到底是什么样”。但是，由于中国经济学者的思维习惯以及中国经济发展的制度变革特征，真正的实证分析尚不多见，大量的研究仍具有很强的规范分析色彩。然而，实证分析方法日益被重视，与规范分析方法相互交叉、相互促进，逐渐融入主流。这方面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发展经济学的结构分析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分析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和广泛采用。结构分析和制度分析由于其规范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论特征，以及符合中国经济制度变革创新的实践需要，因而具有较强的适用性。

这一时期之所以被称为中国经济理论的繁荣发展阶段，一个主要的表现就是经济改革和发展对经济理论的迫切需求以及经济学界的空前活跃，经济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学术观点的层出不穷。根据《全国总书目》、《全国新书目》及《全国经济科学总书目》中所收录的经济学著作目录，从1949~1979年的30年间，中国（内陆地区，下同）共出版经济学理论著作692部（其中著述469部，翻译223部）；而1980~1989年的10年间，中国共出版经济学理论著作4040部（其中著述3463部，翻译577部）。至于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经济学期刊和所发表的经济学论文，则更是卷帙

浩繁、汗牛充栋。在这一发展阶段，中外经济学术交流也是空前活跃，与欧美、东欧、国际组织及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学方面的学术交流全方位展开，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中国经济理论走向世界。

三、1992 ~ 2000 年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深入发展阶段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线索仍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阐发和某些方面的创新以及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引进、研究和应用，而且这两条发展线索进一步交汇、融合，分野虽可辨析，但绝不是泾渭分明。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发展的基础上，20 世纪 90 年代的中国经济理论逐渐深化。比如，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就不仅仅是对经典著作的解读，以及运用标准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和概念对‘苏联范式’进行批判，而主要是力求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并努力将这一开放性理论体系向前推进，使其对现实经济（包括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和改革中的社会主义经济）有更强的解释力和指导意义。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一些理论要素上，概念范畴上，乃至分析方法上的创新。又如，对西方经济学的转述和应用也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对理论的引进不再是零散的，而是整个理论体系、整个学派的引进介绍；对基本理论把握得更准确，对基本分析工具也运用得比较娴熟，而且对现代经济学发展的前沿学科及新学科也有更多的介绍和了解；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借鉴应用也更理性、更求实效。在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的态势下，西方经济学对现实经济运行的解释力、预测力等应用价值将愈益明显。再如，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也有一番新气象。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基本假设、理论框架上力求简洁、力求严密的特点以及力图使每一个经济学范畴都可作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深刻地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学界。在对现实经济的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解释力和预测力确实颇具魅力。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高度抽象力、强大的逻辑推理以及对社会经济生活中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利益关系的透彻分析又是西方经济学所不及的。从这一层次看,20世纪90年代这两大理论体系的融合就不仅仅是若干范畴、概念上的交叉和吸纳(如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加进均衡价格、机会成本、效用函数、消费函数、乘数原理、市场均衡等范畴),更是在基本理论框架、分析方法、基本范畴体系方面的相互借鉴、交叉和融合。当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两种理论范式,虽然都是研究人类社会经济问题,但由于理论视角不同,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基本范畴体系、理论框架和基本内容都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是同一理论体系中不同流派的差异,而是两种理论体系的差异。从科学发展的角度看,这两大理论体系最终能否融为一体,目前尚无法作出定论。但至少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这两大理论体系虽然有所交汇、有所融合,但尚未整合于同一框架中。

总之,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经济学者以更扎实的专业训练、更冷静的思考、更深入的研究,把中国的经济理论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1979~2000年这20余年中,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是与改革开放的历程密切相关的。改革开放不仅是作为一种环境和氛围影响经济理论的发展,而且还作为一种“内生变量”,直接提出问题并提供研究素材,以决定经济理论的时代性、致用性特征。

第 一 篇

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 经济学研究

第一章 1949 ~ 1978 年马克思主义 经济学研究

根据学术界考证，中国人知道马克思和社会主义这些名词的时间可上溯到 19 世纪末。但就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引入而言，最早在我国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完整译文是施仁荣翻译的恩格斯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当时以《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的书名连载于 1912 年上海的《新世界》半月刊。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系统传播，则是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的。据胡寄窗教授《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的统计，20 世纪 20 年代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译著有 48 部，30 年代达到 110 部，40 年代略有回落，为 64 部。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这不仅表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著作的全面、系统的翻译介绍，还表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广泛深入的学习研究，更重要的是表现在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研究新的经济问题，在理论上作出了若干创新，并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时代特征

一、1949~1965 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特征

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研究有两条发展线索，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著作的学习和研究；二是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引入和研究。在理论特色上，前者着重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把握和阐释；后者着重于概念的演绎和推理，特别是一些抽象的概念、定义、观点上的争论。当然，这两条发展线索并不截然分立，而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在理论特色上也不是泾渭分明，而是兼而有之，只是在某一方面更为突出而已。正因为如此，这一时期经济理论研究的一个基本特征是规范性和极强的思辨色彩。

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课题比较集中，主要涉及以下一些方面。

1. 政治经济学的对象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关于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研究，最初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定义为生产关系。1952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明确指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人们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此后，这一观点被普遍接受，并逐渐趋于极端，脱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抽象地讨论生产关系。在1959年，学术界提出了生产力也应纳入政治经济学对象的观点，认为不应机械地割裂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联系，在任何历史发展阶段，不存在离开生产力而单独存在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总是彼此矛盾而又互相统一，作为生产的内容和形式而构成社会的物质基础。在任何社会形态中，在

任何历史发展阶段中，都不会有离开生产力而单独存在的生产关系，也不会有离开生产关系而片面孤立的生产力。因此，政治经济学不是单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必须结合生产关系性质，同时分析和综合各个社会经济形态的生产力性质，并且进一步研究生产力性质与生产关系性质彼此间的区别点和结合点。这一观点提出后，在理论界引起了一场大讨论，中心问题是政治经济学对象是否应当包括生产力，以及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生产关系应当包括哪些内容。当时较多的观点并不同意将生产力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认为政治经济学不研究生产力的结构和运动规律，而是把生产力作为生产关系运动发展的物质基础，作为物质生产关系产生、发展和衰落的物质条件，作为生产关系及其作用的结果来研究。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力的目的，不是为了说明生产力本身的运动规律，而是为了阐明生产关系发展变化的规律。政治经济学要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中来研究生产的社会方面，即生产的社会关系，但绝不能因为如此，就把生产力也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讨论中，也有学者提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而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体。关于这个问题的论争几经起伏，并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又掀起高潮。

我认为，这个论题本身并无多大的价值。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或研究重点无疑是社会生产关系，马克思的重要贡献就是揭示了商品、资本、价值、剩余价值所包含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产关系范畴是与生产力相联系的，在考察生产关系时不能将其与生产力割裂，而且生产力是生产关系研究的前提条件。换言之，只有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割裂，这个论题才存在。因此，该论题并不是一个定义严密的问题，最终也没有得出一个定义严密的结论。但在论争过程中对生产关系、生产力、生产方式、政治

经济学的性质及研究方法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于提高这方面的理论认识和学术水平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2.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主要围绕以下两方面展开：一是在我国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否发生作用；二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内容和表述。第一方面问题的主要观点有四种。第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就是我国过渡时期的基本经济规律。社会主义经济虽然在过渡时期还没有完全占统治地位，但随着我国经济的日益发展和国家对经济命脉的掌握，社会主义经济已经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它将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而日益发展，以致最后代替一切非社会主义经济。因此，社会主义基本规律决定着我国过渡时期的基本经济规律。第二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在我国过渡时期同时发生作用，因为我国过渡时期既然有两种生产方式：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么就有两种基本经济规律同时起作用。第三种意见认为过渡时期有它独特的基本经济规律。过渡时期既然是一个社会，那么它就应当有反映自身的基本经济规律。只有过渡时期的基本经济规律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退出历史舞台，才能在全社会范围内让位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第四种意见认为过渡时期的各种经济成分各有其自身的“主要法则”。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过渡时期的社会经济成分，每种经济成分由于其自身所具有的条件不同，都有着决定支配该种经济成分的主要过程主要方面的主要经济法则。

第二方面问题的主要观点有以下几种。一是同意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表述，即

“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二是主张用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的“发展生产，满足需要”来代替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表述，这个意见在学术界很有影响，流传甚广。三是引用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的有关论述，认为“公共必要价值”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

当时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问题的讨论是比较广泛的，在有些方面的研究比较深入。通过讨论和研究，对基本经济规律、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过渡时期社会形态特性、社会主义生产与消费的关系等理论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然而，基本经济规律是一个抽象的理论概念，加之当时并没有较长时期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作为实践参照，所以这方面的研究和讨论大多是从概念到概念的纯逻辑推理，缺乏对现实经济的调查统计和实证分析，有些讨论甚至是在用词上刻意推敲，大打笔墨官司。例如，有的文章对“主要的”经济法则和“基本的”经济法则作大篇论证，一方认为“主要的”并不是“基本的”，另一方则认定“主要的”实际上就是“基本的”，两者无法区分。这种规范分析的方法和形而上学的学术风气在当时是比较普遍的。有关这一问题的论争告一段落以后，一些论争的参加者反省道：有许多文章很少是根据中国统计材料的研究，往往只是用若干事例来证明某些结论。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没有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从实际出发、详细占有材料的研究方法，所以研究问题不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对中国的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而往往是满足于把这些原理加在现实经济生活的头上。

3.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两个重要范畴，结

合当时中国在生产关系上的社会主义性质和生产力发展的落后状况，这一问题更具有实际意义。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主要围绕以下几方面展开：一是生产力包括哪几个要素；二是生产力中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三是生产力的性质；四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五是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六是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七是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些方面的讨论虽然非常热烈，但基本上是概念之争，对经济学的发展无甚大的实际意义。

4.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及价值规律的作用

1957年，我国理论界开始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问题展开讨论。1959年4月，在上海召开了全国第一次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的理论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经济部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理论工作者和实际部门的同志 250 人左右，提交大会的论文和调查报告近 80 篇，集中讨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计件工资和按劳分配等问题。这是建国后到 20 世纪 50 年代末规模最大的一次学术会议。会议前后出现了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讨论的第一次高潮。据不完全统计，从 1958 年底到 1959 年 7 月，全国主要报刊发表的有关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的文章近 300 篇。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理论研究主要围绕以下一些问题展开：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国营企业之间交换的生产资料是否是商品；国家与国营企业职工之间的交换是否是商品交换；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是新型的，还是资本主义留下的旧形式，会不会产生资本主义；等等。其中一个中心问题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当时的主要意见，一是同意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观点，认为是由两种社

社会主义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并存所决定的；二是认为按劳分配是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三是认为经济利益的差别是根本原因；四是认为部分劳动的个人所有制或劳动力私有制是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应当指出，当时的研究突破了斯大林理论的框框，在科学阐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问题上前进了一步。两种公有制并存并不能从实质层次说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存在的根本原因，而应当进行更深层的探讨。但是，当时的讨论主要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分析研究，而少有从生产力的角度、从社会分工的发展角度去探讨问题，所以一些新的观点在理论上也缺乏说服力。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的理论研究，主要围绕以下一些问题展开：什么是价值规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价值规律的地位和作用；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相互关系；等等。第一个问题的主要观点，一是认为价值规律是价值的存在和运动的全部过程的规律。价值是物化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本身，并非商品经济所特有。社会必要劳动反映价值的“量”的概念，价值的“质”则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社会主义社会重视价值概念，就意味着重视经济效益。二是认为价值规律是价值决定的规律，即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商品的价值。三是认为价值规律是等价交换的规律，即商品的价格倾向于与价值相一致的一种必然趋势。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的代表性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受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支配的，价值规律只可能起辅助的作用。价值规律主要是在国家计划以外的社会经济中起作用。与这一代表性观点不同，一种意见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与经济核算的矛盾统一体，不应过分强调计划的一面而否定价值和价格之间的关系，否定价格对生产、分配、流通的作用。另一种意见认为应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基础上。也有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经济规律，它们同时